

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



纪念版

福利经济及国家理论

〔美〕鲍莫尔 著



商務印書館
The Commercial Press

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



纪念版

福利经济及国家理论

〔美〕鲍莫尔 著

郭家麟 郑孝齐 译



商务印书馆

2017年·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福利经济及国家理论/(美)鲍莫尔著;郭家麟,郑孝齐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2017

(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120周年纪念版.分科本.经济学)

ISBN 978-7-100-13841-3

I. ①福… II. ①鲍… ②郭… ③郑… III. ①福利经济学 ②国家理论 IV. ①F061.4②D0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7)第 094937 号

权利保留,侵权必究。

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
(120周年纪念版·分科本)

福利经济及国家理论

〔美〕鲍莫尔 著

郭家麟 郑孝齐 译

商务印书馆出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36号 邮政编码100710)

商务印书馆发行

南京爱德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ISBN 978-7-100-13841-3

2017年8月第1版

开本 880×1240 1/32

2017年8月第1次印刷

印张 6 1/2

定价:29.00元

William J. Baumol
**WELFARE ECONOMICS
AND THE THEORY OF THE STAT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1952

本书根据美国哈佛大学出版社 1952 年版译出

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

(120 周年纪念版·分科本)

出版说明



1

2017 年 2 月 11 日,商务印书馆迎来 120 岁的生日。120 年前,商务印书馆前贤怀揣文化救国的理想,抱持“昌明教育,开启民智”的使命,立足本土,放眼寰宇,以出版为津梁,沟通中西,为中国、为世界提供最富智慧的思想文化成果。无论世事白云苍狗,潮流左右激荡,甚至战火硝烟弥漫,始终践行学术报国之志,无改初心。

迻译世界各国学术名著,即其一端。早在 20 世纪初年便出版《原富》《天演论》等影响至今的代表性著作,1950 年代后更致力于外国哲学和社会科学经典的译介,及至 1980 年代,辑为“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汇涓为流,蔚为大观。丛书自 1981 年开始出版,历时三十余年,迄今已推出七百种,是我国现代出版史上规模最大、最为重要的学术翻译工程。

丛书所选之书,立场观点不囿于一派,学科领域不限于一门,皆为文明开启以来,各时代、各国家、各民族的思想与文化精粹,代表着人类已经到达过的精神境界。丛书系统译介世界学术经典,

引领时代思想,为本土原创学术的发展提供丰富的文化滋养,为推动中国现代学术和现代化进程做出了突出的贡献。

为纪念商务印书馆成立 120 周年,我们整体推出“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120 周年纪念版的分科本,延续传统分为橙色、绿色、蓝色、黄色和赭石色五类,对应收录哲学、政治·法律·社会学、经济、历史·地理和语言学等学科的学术经典著作,既利于文化积累,又便于研读查考,同时向长期支持丛书出版的译者、编者和读者致以敬意。

两甲子后的今天,商务印书馆又站在了一个新的历史时间节点上。我们不仅要铭记先辈的身影和足迹,更须让我们的步伐充满新的时代精神。这是商务人代代相传的事业,更是与国家和民族的命运始终紧密相连的事业。我们责无旁贷,必须做好我们这代人的传承与创造,让我们的努力和成果不仅凝聚成民族文化的记忆,还能成为后来人可以接续的事业。唯此,才能不负前贤,无愧来者。

商务印书馆编辑部

2017 年 5 月



译序

现代资产阶级的福利经济学可分为新旧两派。旧福利经济学的代表人物主要是英国的霍布森(1858—1940)和庇古(1877—1959);新福利经济学的主要代表人物有勒纳、希克斯、柏格森、席托夫斯基和萨缪尔森等。新旧福利经济学的区别,主要在于它们所用的分析方法不同:旧福利经济学是把边际效用作为基数来衡量个人和社会的福利,而新福利经济学则认为边际效用不能用基数来衡量,只可用序数衡量。至于新旧两派对社会福利的目标及国家干预经济等各种伦理问题和政策问题,则言人人殊,没有形成一个为经济学界所公认的体系。鲍莫尔这本书是用无差异曲线所表示的序数来分析问题的,属于新福利经济学一派。

鲍莫尔在1922年生于美国纽约。1942年毕业于纽约市立学院,在美国农业部工作一个时期后即赴英国留学。1949年在伦敦大学经济学院得博士学位。1949—1962年任普林斯顿大学助理教授。1952—1954年任副教授。1954年以后一直在该校任教授,并兼任该校数学研究会顾问。他是美国计量经济学会会员和美国经济学会的执行委员。著作除本书外,还著有《动态经济学概论》(1951)、《经济作用与经济政策》(1954)、《商业行为、价值和增长》(1959)、《经济理论及其运行的分析》(1960)等。



本书的特点是,除在方法论方面把“新古典主义”的理想产量理论用无差异曲线给以新的雕琢和发挥外,在目的论方面又发展了凯恩斯等人的国家干预经济的学说。鲍莫尔简要地叙述了早期各家有关福利经济的论述后,就开始讨论理想产量问题。他用相当多的篇幅以他独具特色的数学公式发展了帕累托以来的无差异分析方法。这是本书在方法论方面的贡献。他认为,理想产量的标准不是唯一的,对于偏离理想产量的情况也是不容易辨认的。但是一旦我们知道了偏离的方向和大小,就能采用奖励和赋税的方法加以改善。这种改善并不需要放弃市场机构的运用。因为用任何中央计划机构或其他组织替代市场机构来作为资源配置的决策者,其消除偏离理想产量的效果,不见得会比市场调节更好些。如果中央机构把消费者的需求估计错了,那就不仅会抵消这种计划的好处,而且会产生不良的后果。

这种观点,也正是美国经济学家们今天所主张的以市场经济为主、以政府干预为辅的混合经济观点。因为在帝国主义时代,垄断企业越来越多,市场上的垄断因素也就越来越大。在这种情况下,如用无差异曲线分析理想产量问题,就必须先在成品市场的需求都完全自由、没有外部经济等假定前提下进行分析。但在这样分析之后,马上就须放弃完全竞争的假定,引入垄断因素、消费行为、失业均衡等偏离理想的因素,以论述从完全竞争过渡到国家干预的问题。他说,垄断因素不仅使产量偏低,而且会把相当大的人力资源用于不符合全体经济福利的目的。对于消费者行为,他说,有很多方面,消费者的需求要受社会上的各种影响;所以完全竞争,无论在概念上或实际上都是有其困难的。关于失业问题,他

说,在失业严重时,大家会希望政府以增加消费来制止危机;在通货膨胀严重时,也会要求政府采取课税、冻结工资、紧缩开支等办法来制止膨胀性的活动。

经过上述论述,著者把论点从自由主义转向国家干预的学说。他认为,一旦偏离了社会上最大集体福利的理想,如果没有国家法律的约束,常常会遇到来自个人或一部分人的阻力,而且这种偏离常常由于无知或见闻不全而难以改正。那么,政府的任务究竟应该放在哪里呢?他认为政府主要应当帮助社会成员用最大的效率来达到他们自己的目的。这样说来,统驭市场(但非取消市场)的决策就是政府在经济方面的主要工作。

由于著者在全书的进程中,必须经常改变前提,才能把相互矛盾的理论熔于一炉。所以除对理想产量进行的数理分析外,其他部分的分析都比较粗糙,甚至有许多逻辑不严密的情况。但这是资产阶级福利经济学著作中常有的现象。有人说,福利经济学是资产阶级经济学中最不能令人满意的部分之一。可是福利经济学又是经济学中最值得研究的部分之一。从现在研究国民收入时倾向于用经济净福利来测量经济生活的质量,就可以看出其重要性。从这一点来说,本书对我们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本书的论点、分析方法及其晦涩不明的文句,都给译者的翻译工作带来不少困难。译完后,蒙陈玮同志通篇校阅,谨此致谢。但由于译者水平有限,错误和不妥之处仍在所难免。尚希读者不吝赐教。



目 录

原序.....	1
---------	---

第一篇 外部经济论的推广

第一章 引论.....	5
第二章 早期的某些讨论	13
第三章 理想产量问题	21
第四章 理想产量(续)	72
第五章 积极追求利润	89
第六章 作为准则的竞争	99
第七章 失业均衡及其有关问题.....	112
第八章 有关国际关系的一些问题.....	120
第九章 论点的推广:两种应用的说明	127

第二篇 走向国家的一种经济学说

第十章 关于理想的含义.....	145
第十一章 理想与非理想情况的稳定.....	160
第十二章 经济理论与国家学说.....	168
第十三章 论见闻不全.....	189



第十四章 结束语：福利经济学毁了吗？	197
--------------------------	-----

汉英人名对照表	202
---------------	-----



原 序

本书是我 1949 年春天提交给伦敦大学的博士论文的修订本。论文是在莱昂内尔·罗宾斯指导之下写成的。他给我的种种关怀指导,我是无限感激的,但我不打算在这里多谈我的感受,因为这种感激之情,刻骨铭心,不是翰墨所能尽述。至于我妻对本书的贡献,我也难以用言辞表达,只有铭感于心,谨以本书奉献给她吧!

许多学生、教师或经常来往的朋友们对我的协助,是一种无可估量的贡献,他们使伦敦大学经济学院成为一个真正令人愉快而鼓舞的地方。要开列一张详尽无遗的名单显然是不可能的;在这里我只能举出几位最有直接影响的人士,他们是格雷姆·多兰斯、戴维·芬奇、简·格雷夫、弗兰德和多萝西·哈恩、弗里德里克·海叶克和拉尔夫·特维。

同时我非常感谢马库斯·弗莱明先生、普罗菲索·卢茨先生和卫纳先生三位教授的批评和建议,本文的修订多半是以他们的意见为依据的。我也感谢里查德·昆特先生,他帮助我核对校样和制订索引。

读者无疑会注意到,许多论点同利特尔先生的《福利经济学评论》的观点或哈维里莫在《非自愿经济决策论》(《计量经济学》,1950 年 1 月号)中的分析很接近。我的原稿在上述两文付印之前



已基本完成,只是有几条简明的注释和参考使我满意,因此仓促添进拙著,这倒是无庸讳言的。不妨这样说,能和他们不谋而合,结为文字之交,在我,是昌胜欣忭之至的。

最后,本书的标题,有点言过其实,是相当勉强的。但在我所能想到的书名中,还是以这个最为切近本题。

威廉·J. 鲍莫尔

1950年6月于普林斯顿大学



第一篇

外部经济论的推广

第一章 引论

一

无政府主义和古典的放任主义有很大的差别。^① 在古典放任主义的鼓吹者们的心目中,政府当然是非常需要的组织机构,只要它的活动受到严格约束的话。

在他们的种种著作中,这个观点绝非仅见,表现在他们所列举的各种责任上,他们认为这些责任对于一个治理良好的国家来说,是非常必要的和合宜的。这些责任包括这样的明显项目,例如防卫、契约义务的监督执行、邮政和初等教育的设立等。所列举的每一项目,通常都附有冗长的注释,提出了著者把它列入的理由,并解释为什么最好不把这种特殊的职能委托给私人企业。

可是给人留下的感觉是,他们选择项目的方法多少有些武断。至少一眼就可以看出,其中没有使这些领域特别适合于政府介入的明显特征。而且,由于缺乏一种共同尺度用以决定是不是某种活动适宜于列入政府经管的范围,所以人们总会怀疑,排除某些项目是不是由于一时的感情冲动或失察。

^① 参阅罗宾斯:《经济计划和国际秩序》,第 225—232 页。



明显的是,假托任何尺度来表明政府的适当范围,其本身必定是随意地依据某种特殊的伦理偏见。但是有一个可供选择的处理问题的方法,即是本文所采用的,根据人们的看法,认为它既能用以解决问题,也能用以回避问题。这个方法就是试图确定,在哪些情况(如果有的话)下,同一经济里的人们,为了最有效地追求他们自己的经济利益,感到特别有必要扩大他们政府的职权。然而,我并没有意思说,要扩大政府的活动,就应该符合或者必须符合这个标准。

诚然,在社会成员决意不需要为他们的事业提供合作的情况下,硬说给予充分的知识,公民们就能够最有效地照顾他们自己,无非是一种陈词滥调而已。可是在社会成员部分地相互依赖的地方,这个结论的正确性是值得怀疑的,我甚至敢断言,在某些情况下,它显然是错误的。

根据这一理由,我认为有可能确立某些一般性原则,来探讨社会成员在哪些情况下认为政府应该扩大权力,在哪些情况下认为政府不应该扩大权力。这个分析只不过是把用于讨论外部经济的一般论证加以扩大或予以一般化罢了。在这个过程中,古典学者认为政府应该开展的那些活动,其相互间的联系就看得更明显了。而且,可以说,至少在某些情况下,就这个准则来说,古典学者所列举的活动并不是完全的。

乍看起来,本文的目的似乎是超过了实际可能,过于奢望。我希望把一种国家经济理论建立在扩大外部经济论的基础上。这个理论应该解释,为什么有了理性的公民(特别是在民主制度下),还完全容忍政府干预经济事务。同时还应该概括地说明在这种情况下

